

文章编号 1001-7410(2005)06-750-11

水洞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

——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

侯 亚 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 水洞沟文化从发现之初便以其所具有的西方旧石器中、晚期特点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被后来的很多学者引证为东西方交流的有利证据。但是对于在这一文化现象里所发生的交流模式的探讨依然含糊,或者它不言而喻是一种“西来”的模式。随着对该文化中存在的“勒瓦娄哇石核”技术的揭示,这一观点似乎只会被加强。然而新的研究证据使人们有可能质疑过去的观点,而重新审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文章通过水洞沟文化中“东谷坨石核”的再现,对水洞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位置提出新的看法,进而探讨华北小石器文化的主导性与传播性,并指出确立旧石器时代早期“华北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概念的必要性,提出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丝绸之路”的前身应为史前时期即已存在的“石器之路”的假说,认为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风向标。

主题词 水洞沟文化 东西方交流 “东谷坨石核” 华北小石器文化的自源性、主导性与传播性 “石器之路”

中图分类号 K871.1 **文献标识码** A

1 水洞沟文化与中国旧石器晚期

82年前,由法国人在远东开始的对于华北北部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打开了中国旧石器学术研究的大门。80多年来,水洞沟一直吸引着人们对人类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关系问题的注意力,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本文希望能对这一话题在新的时期给予进一步的探讨。

当年法国人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对水洞沟的文化评价说“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1]。作为来自法国史前文化研究前沿的学者,初来乍到,他们所熟悉的自然是法国那些已经被发现了的和被排列好了的史前人类的文化,比如,“莫斯特”、“奥瑞纳”这些代表着特定文化分期和内涵的名词。所以,当他们在水洞沟发现了看似熟悉的器物类型,用西方已有的名词来称呼它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中国本土的材料是不是一如它们暂时被给予的名称在欧洲所代表的含义,则需要时间来回答。事实上它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先入为

主的错觉,好像东方这块黄河岸边遗址的文化已然地受到了遥远的西方史前文明的影响,水洞沟遗址的工业也似乎无疑的成为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旧石器文化。《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提出,水洞沟文化既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般特征,但更具有与后者不同的明显特点,很难将其归入我国目前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任何类型;认为水洞沟文化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2]。

水洞沟属于旧石器文化晚期,李炎贤将中国旧石器晚期文化划分为4个大的系列^[3]:

(1)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石叶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早期的丁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4,5]都有所发现,在早期的北京人遗址、小长梁、观音洞遗址也有少数标本可归到石叶一类,虽然没有发现相应的石核,但推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文化系列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技术类型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2)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里有以下川、薛关、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细石

作者简介:侯亚梅 女 40岁 研究员 旧石器考古学专业 E-mail houyame@ivpp.ac.cn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172009)、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斯洛文尼亚(2001-2002,2003-2004)合作项目和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启动专项资金项目共同资助

2005-03-10收稿,2005-07-22收修改稿

核、细石叶和加工精制的石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片、石叶以及用石片和石叶加工的石器如端刮器、雕刻器等工业系列。关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在早期遗址有一些石核具有类似细石叶的剥片痕迹,但这类石核不够系统,仍有待进一步工作和探讨。

(3)以零台面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它是石片文化传统的分支,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如:水城硝灰洞),延续到新石器时代。

(4)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石叶文化系列中仍有重要的作用。

对以上划分,笔者有如下初步评价和补充看法:

关于第 1 个系列,无论是在丁村遗址还是在许家窑遗址石叶都不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成分。石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很不清晰,总是零星地、不成规模地出现,很少成为某个文化的主体,如丁村 54:97 地点有一件石叶制品^[6],河北板井子有 12 件石叶^[3,7],而许家窑文化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石叶^[8],与水洞沟文化普遍存在的石叶相比有较大的差别。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文化系列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技术类型继承和发展的结果的推测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

关于第 2 个系列,细石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发展成为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北方出现了很多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具有相当的特色。李炎贤注意到早期遗址有一些石核具有类似细石叶的剥片痕迹,并将它们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相关联,同时指出这类石核不够系统,有待进一步工作和探讨。李炎贤的推测已开始得到一些新的研究证据的有力支

持:泥河湾盆地“东谷坨石核”的发现与研究代表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了系统的定型化的石核,它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楔形细石核表现出密切的关系,为华北细石器的起源露出了一线曙光,值得注意和进一步开展有关工作;该文化系列在水洞沟仍有表现(见后)。

关于第 3 个系列,是中国具有地方区域性特色的文化,在华南特别是西南部有突出的表现,如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和兴义猫猫洞文化^[9,10];以及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穿洞、安龙观音洞等^[11~14]。

关于第 4 个系列,石片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从早期的泥河湾盆地东谷坨、小长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到后期的萨拉乌苏大沟湾地点、辽宁海城小孤山、山西峙峪遗址、贵州桐梓马鞍山、河南安阳小南海等^[1,15~20]一直都有表现。笔者认同晚期文化中的石片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而石片文化在水洞沟仍然有充分的表现:其工具类型里除了尖状器的毛坯是以石叶为主之外,其余器型的毛坯都是以石片为主,以最常见的边刮器类型为例,其中以石片为毛坯的占 43.2%,以石叶为毛坯的占 25.7%^[2]。

2 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与来源

水洞沟文化内涵丰富,包括 3 个方面(图 1a~1c): 1)石叶工具是水洞沟文化特点最为显著的部分,通过从普通的石叶石核和勒瓦娄哇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石叶加工成各种工具,如:端刮器、边刮器、雕刻器、锯齿刃器、尖状器、厚背小刀等; 2)石片工具依然是水洞沟文化的主要成分,但是工具的毛坯多以从勒瓦娄哇石核上打下来的石片工作为基础,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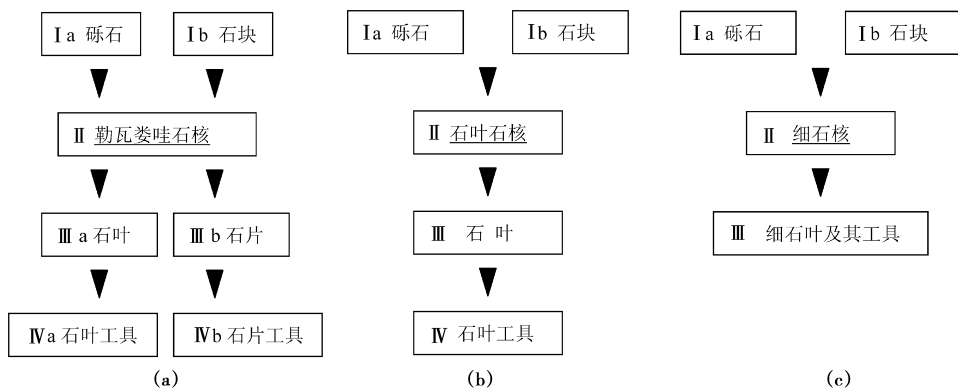


图 1 水洞沟石器工业的主要作业流程图解(a~c)

Fig 1 Schema of "chaîne opératoire" in Shuidonggou lithic industry (a~c)

进一步加工成边刮器(含聚汇型边刮器)、尖状器、锯齿刃器等等; 3)以细石核和细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包括用细石叶加工的工具。

事实上,勒瓦娄哇技术和有关的石叶生产技术令水洞沟工业有别于中国其他旧石器时代的工业,而成为水洞沟文化的中心特色。水洞沟工业中石片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三头并行的现象值得注意。水洞沟工业的作业流程表明水洞沟工业所追求的目标是生产出更多的石叶,因为石叶比一般的石片更加规整,以石叶为毛坯也更易于加工出所需要的工具,其制作者也完全掌握了生产石叶的技术。虽然最终加工出的工具类型是华北从旧石器早期就一直存在的类型,最终的面貌上也谈不上有太大的区别,像各个类型的边刮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端刮器等,功能上并无本质区别,但是程序和概念的变化非昔日可比,它直接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改变,映射出时代风格的差异。

水洞沟文化来自何方? 水洞沟工业是纯粹的西方元素的组合吗? 这一点是否确信无疑? 水洞沟文化出色的勒瓦娄哇工艺和生产石叶的技术的确使它

在中国境内旧石器遗址的文化传统上显得较为“别致”和“异样”,也似乎不可否认它纯粹的外来性质。但 2002年 5月,当笔者有机会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IPH)观察来自水洞沟 20世纪 20年代发掘出的标本时,发现几件小型石核,极像笔者曾初步研究并命名的“东谷坨石核”类型(图 2和图 3)¹⁾[21],完全是一个体系的东西。当看到第一件这样的标本时,还不敢贸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而接着从中看到更多同类的石核之后,给人预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扯不断的渊源联系,这促发笔者产生新的思考或者说是思路:水洞沟不仅仅是西方的因素,在后来的西方因素进入之前,这里曾存在一个根源于东方传统的文化,在水洞沟文化中保留下来的“东谷坨石核”代表的便是这个东方文化的印痕。

回顾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的格局,即泥河湾盆地以小长梁、东谷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工业除了人们熟知的石片文化系列之外,还存在着的一套以“东谷坨石核”为代表的生产小型细长石片文化系列。二者并行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越过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直至晚期,小型细长石片在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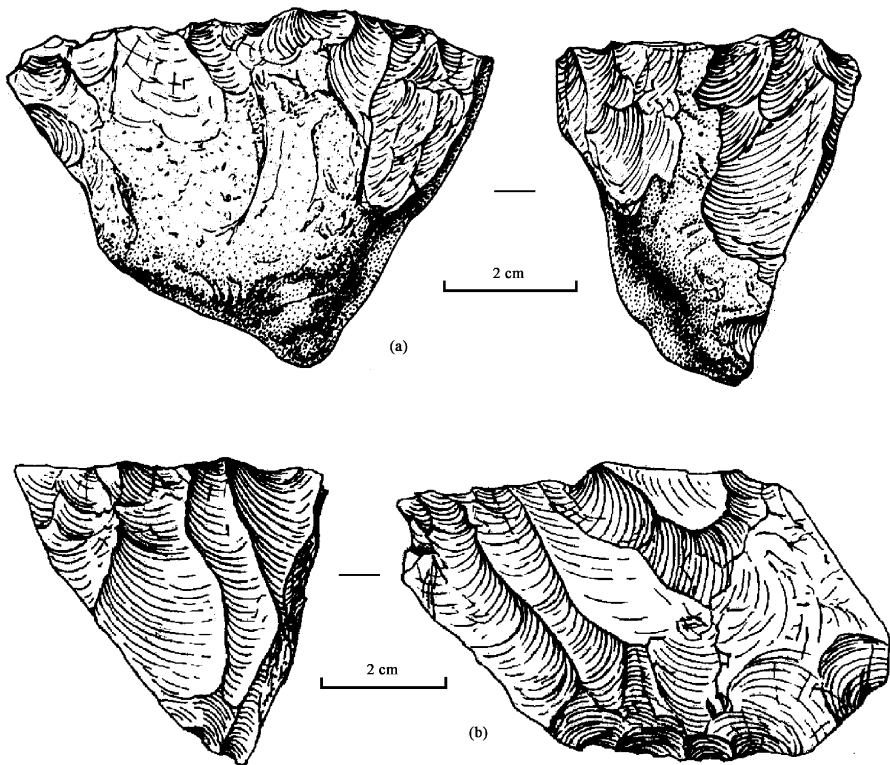


图 2 “东谷坨石核”标本示例

(a)标本 97DGT 576 (b)标本 C110

Fig 2 Examples of “Donggutuo core”

1)侯亚梅. 东谷坨石器工业. 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学位毕业论文,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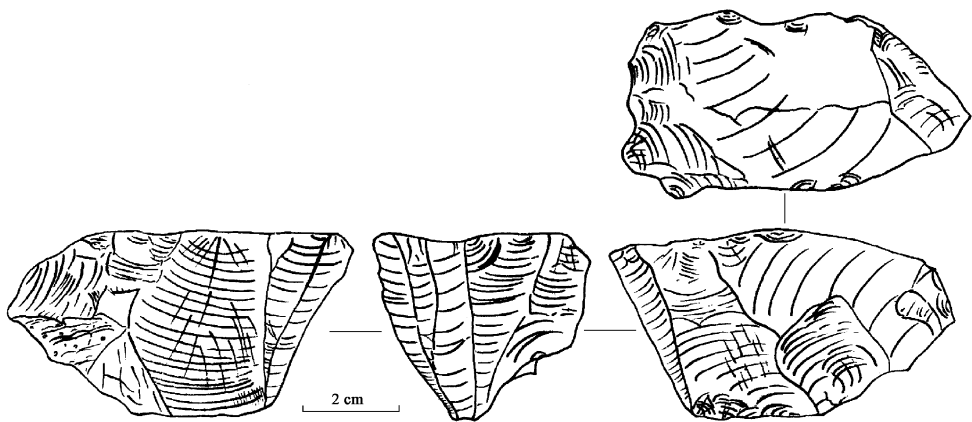


图 3 水洞沟工业中的“东谷坨石核”类型

标本 1929-2. 242.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

Fig 3 One example of “Donggutuo core” from Shuidonggou industry

起源地发生质的转变,成为具有华北地方特色的细石器文化系列^[8, 15~18]。本文的研究显示,水洞沟的细石叶石核不具有明显的华北晚期细石器文化特色的烙印,反而带有明显的华北旧石器文化早期的细石器传统,这说明以华北为中心的文化很早就已经传播到了水洞沟;到了旧石器的晚期,华北中心发生的技术革命对于水洞沟当地的影响微甚或全无,以至于旧石器晚期十分发达的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华北细石器文化传统在水洞沟尚无踪迹,看到的则是旧思路的延续和停滞不前。相反,西来文化势力的大举挺进,促使水洞沟发生了一定规模的以石叶文化取代石片文化的变革,其石片也多产自勒瓦娄哇石核^[22],工具的功能虽然没变,思维方式却发生了质的改变。但是,无论是石叶工具还是石片工具都取代不了小型细长石片(实为细石叶的前身)的功能,这使得“东谷坨石核”的类型得以保留,并使水洞沟工业烙上了东方本土的烙印。所以,虽然水洞沟接受过华北旧石器早期文化传播的洗礼,却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比如最有可能的环境要素)错过了当时(旧石器晚期)以泥河湾为中心的华北腹地的细石器革命,而成为迄今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方勒瓦娄哇技术和石叶技术向东方传播所能抵达的最远端点和代表。

关于以我国华北为主体的石叶和细石叶文化的关系,中国的研究者有几类观点:1)长石片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两者归并到一起,称“长石片—细石器工业”,两者存在继承关系^[23];2)石叶和细石

叶的剥片技术明显不同,在石核的修理技术上也很不同,两者间不存在传承关系,而认为细石核的祖先可以在华北的一些文化组合中观察到^[24],与此类似,李炎贤也主张两者是平行发展而不是先后发展的^[3];3)从西方传入的石叶技术与砸击技术在水洞沟融合孕育和产生了细石器文化,并由此扩展到整个华北和周边地区^[25]。

笔者倾向认同两者并行发展的关系。“东谷坨石核”的发现表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繁荣的细石叶工业有其自己古老的根源和传统,可以追溯到大约 110 万年以前^[26]。与小长梁遗址和更老的马圈沟遗址的地层^[27, 28]相比,东谷坨遗址文化层所在的地层反映出当时的气候曾经历过湖水退缩,气候相对地从暖湿转向干冷的明显变化。泥河湾盆地的湖盆经历过多次湖进与湖退的变化^[29],东谷坨遗址的时代处于湖水变化周期中的早期环节,经历了马圈沟遗址和小长梁遗址湖水丰沛稳定的阶段之后,东谷坨遗址时期发生了明显的湖退现象,这会不会是促成发明“东谷坨石核”类型、生产细小长石片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种文化现象在后来的长时间内似乎没有明显的突破和改变,环境是否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多年前,盖培就注意到了在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 地点出现的某些属于楔形石核¹⁾传统的萌芽^[24],另外已知较早的衔接环节是许家窑遗址的“东谷坨石核”类型^[30]。关于砸击技术,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砸击技术与细石叶的必然联系,也缺乏石叶技术与砸

1)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北方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一类细石核类型,以一个台面为基础,在石核的一端或两端剥取细石叶。楔形石核文化圈以华北为腹地在东北亚广泛存在,沿西太平洋构成马蹄形的文化圈。

击技术结合产生细石叶的直接证据。“东谷坨石核”所使用的技术是锤击技术, 砸击法所起的作用是辅助的, 并非决定性因素。到真正的细石叶繁荣时期, 压制法取代了锤击法。推测水洞沟的石叶技术, 特别是它的勒瓦娄哇技术来自西方的影响, 而它的细石叶则是东方本土文化影响的产物, 在石叶技术到来之前虽然并不发达, 但已经存在。同时, 在“东谷坨石核”开始出现的时代, 尚没有任何长石片的证据, 这说明华北细石器工业技术传统的起源早于长石片(石叶)技术传统的起源。石叶系列和细石叶系列在水洞沟的并存倾向说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继承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国内学术界存在着对石叶(blade)、细石叶(microlade bladelet)概念的区分不够严格的情况, 以至于有的作者文字上所说的石叶有时候指的却是细石叶; 又如, 把小石器统称为“细石器(microliths)”会在一定程度上混淆有关的概念。鉴于这样的情况, 有学者很可能用“长石片”一词指代石叶。笔者赞同安志敏阐明“细石器”的定义应仅限于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制作的工具的看法^[31], 同时认为可以用“小石器(small tools)”和“细小石器(micro tools)”分别指称特有的“细石器”概念之外的小型(small type)和微型(micro type)石器。

3 华北小石器的源流和(古代“丝绸之路”之前身)“石器之路”的假说

欧洲的小石器文化与东方是否有过关联, 它们从未受到东方因素的影响吗? 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欧洲旧石器早期具有稳定的小型细长石片文化系列, 如果说东方的细石叶传统由来已久, 那么, 欧洲的细石器文化是否完全独立自主地发展? 欧洲旧石器文化中期以莫斯特文化为特点的技术因素在华北小石器文化中是否全无踪影? 笔者初步观察研究认为, 华北小石器文化的早期孕育着某些后来被称为莫斯特文化的要素, 不排除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 特别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的奥瑞纳文化有接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可能。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勒瓦娄哇石核技术为代表, 以莫斯特文化为标志)向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奥瑞纳文化的出现为标志)的过渡在欧洲和西亚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和现代人的起源, 学者们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发挥了不少的想象力, 也存在许多困惑^[32], 而中国所能提供的证据还远未为人

所知, 尤其不被学术界向来表现活跃的西方学者所熟悉和了解, 使得现代人起源的许多争论大多局限于西方人所熟知的来自于非洲、欧洲和西亚等方面的证据, 随着新工作的进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早期文化方面的证据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的线索可能会给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另外的方案, 成为促使该问题峰回路转的关键。本文推测有关现代人起源的问题的明朗化将很可能依赖于这块土地上所蕴含的答案, 正如水洞沟文化的最初研究者所指出的: “在亚洲最稳定的土地上将会发生重要的生物学事变……。在灵长类动物的逐渐进化中, 亚洲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 “欧洲旧石器时代工业连续发展的独立性并不是原来就有, 而只是从共同基础上汲取各方面(养分)的重叠结果”。“它们通过连续的波浪到达我们这里。而其真正的源头应到别处去找, 而不是在欧洲的死胡同里去寻找”, “我们认为, 亚洲仍然像是一个最古老的人类工业的巨大的扩散中心。”^[1]。事实上, 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相当发达的小石器, 具备了向莫斯特文化发展的潜力和优势。如果说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勒瓦娄哇技术包括石叶技术跋涉了 8 000 多公里的距离传到了东方^[22], 那么, 以华北早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向着包括西方在内的周边其他地区的缓慢传播并非没有可能。2005年5月笔者有机会去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民族学与考古学研究所访问, 在那里观察了来自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南西伯利亚)若干以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为代表的含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遗址的石器标本, 其中的典型遗址如 Kara Bom, Denisova 和 Ust Karakol 跟水洞沟遗址一样, 在这些遗址中除了观察到西方旧石器中晚期的典型器物类型勒瓦娄哇石核、石叶石核及其相关的石器制品外, 竟无一例外地发现了“东谷坨石核”类型(图 4), 它们所在层位的年代处于距今 4 万年前后, 比水洞沟稍早。位于蒙古国的 Chikhen Agui Cave 遗址也出现了“东谷坨石核”类型^[33], 其年代与水洞沟相仿。看来也许这些与水洞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较早的时候便接受过东方的影响, 形成带有东西方共同因素的文化混合体。如果说“勒瓦娄哇石核”是代表典型的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标志, 那末, “东谷坨石核”则代表着典型的在东方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经过中期直到晚期一直存在的另一个文化标志。安志敏在研究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时讨论了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 将细石核分为五式, 其中 I 式为船底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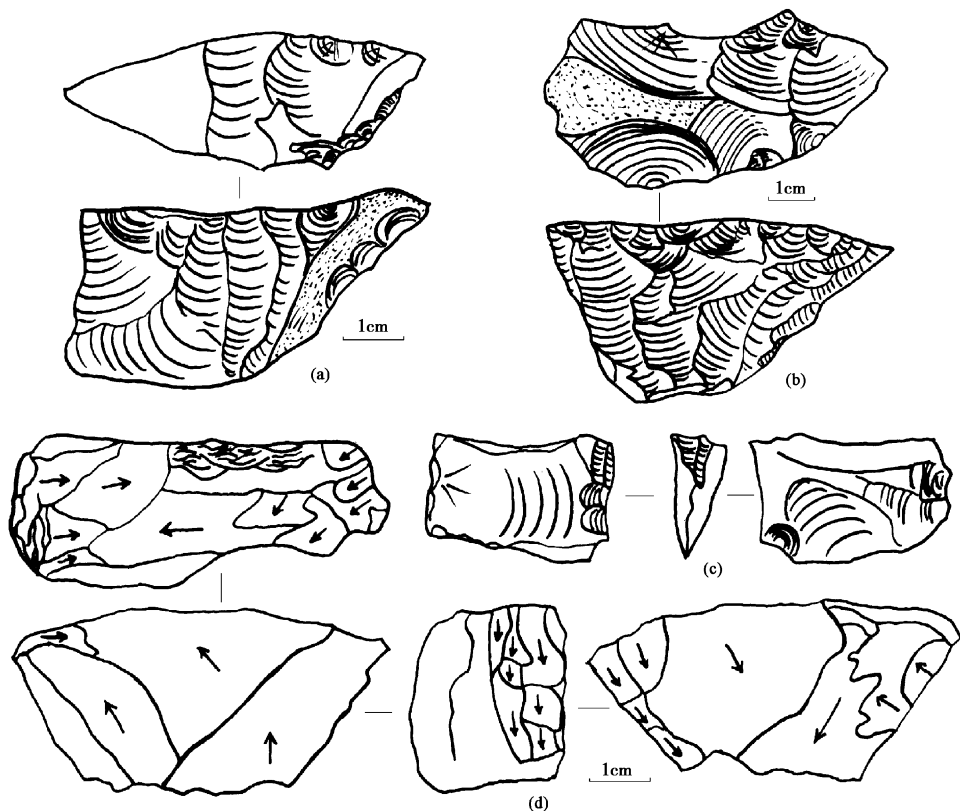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旧石器中晚期遗址“东谷坨石核”类型示例

(a)和 (b)Ust-Karakol Cave (c)Kara Bom (d)Denisova Cave

Fig. 4 Examples of “Donggutuo core” from Middle and Upper Paleolithic site in Altai region in Russia

核, II 式为扁锥形石核, III 式为楔形石核, 这三式总归为扁体石核, 另外两式(圆柱形和圆锥形石核)归为圆体石核^[31]。而以船底形石核为代表的扁体石核属于较原始的形制, 其产生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内蒙古萨拉乌苏、山西朔县峙峪和河南安阳小南海等遗址(图 5), 或更早的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 地点^[34, 35], 以及较晚的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的典型细石器^[31]。而新近发现的“东谷坨石核”具备了扁体石核的主要特点, 呈现出的是扁体石核最原始的面貌, 它所代表的剥离早期细石叶的技术是细石叶华北起源说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证据(见图 5)。当年安志敏剖析了细石器起源的欧洲说、西伯利亚说、蒙古说和中国的华北说这 4 个说法, 从细石器的产生、工艺传统以及年代、分布、发展和延续三大方面分析和肯定了细石器工艺传统发源于华北地区的看法^[31]。

此外, 与细石器传统共存已久的华北小石器工

业面貌的发展与影响也值得在未来予以认真的思考和探讨。本文认为“东谷坨石核”线索的系列发现一方面为细石器的华北起源说提供了更早的证据,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华北的小石器文化包括细石器文化传统曾经向外输出并有力地影响了近到蒙古国, 远至俄罗斯, 甚至更远的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 由此本文提出旧石器时代小石器文化的“华北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的说法。这里很早就有了以小石器为特点的工业技术的萌芽, 以泥河湾为中心的小石器文化从未间断过, 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是以自源性和主导性为特点, 以本地为中心在适当的时候曾经向外输出的一种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 “双向传播”¹⁾伴随着“逆向传播”²⁾这两种方式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模式, 也是水洞沟文化的发展模式。其中环境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全球气候波动的影响, 特别是末次冰期的来临, 环境的剧变加强和激发了技术的革新和新文化的繁荣, 这一影响延续到了旧

1) 双向传播指两地相互之间的文化传播方式

2) 逆向传播指由本地传往外地的文化在外地发展一段时间之后从外地传回本地的文化输出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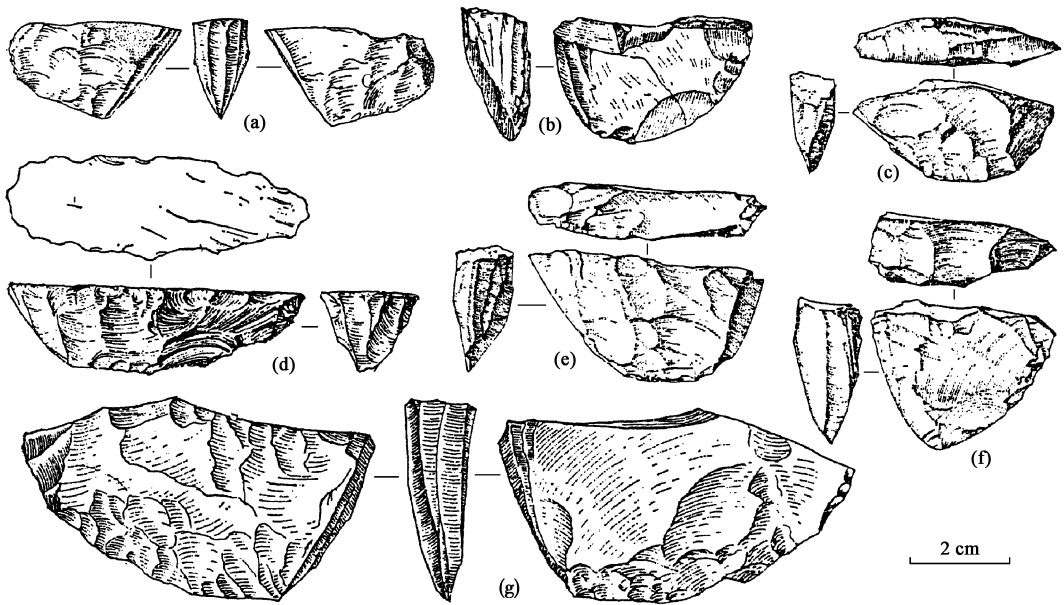


图 5 华北旧石器遗址中的细石核类型的原始类型——扁体石核
 (a)海拉尔 (b)和(c)沙苑 (d)下川 (e)和(f)虎头梁 (g)顾乡屯

Fig 5 The primitive type of microblade core from Paleolithic sites in North China: The narrow-shaped cores

石器时代的晚期。最近通过对末次盛冰期前后中国北方遗址文化现象与分布特点的研究证明末次冰期的环境恶化导致了很多遗址的南迁,类似的影响在中国北方具有普遍性¹⁾,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环境对于人群迁徙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此外本文的观点也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理论”^[36]提供了文化方面的新证据。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前苏联与蒙古国,俄—蒙两国特别是 90 年代俄—美—蒙三国在阿尔泰地区(以蒙古国和西伯利亚为主,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合作项目研究成果的分析, Derevianko^[33]认为该地区本土文化元素的独特性大于外来文化元素的影响,是一处通过对本地独特生态环境的适应发展起来的具有更多本地特点的文化地域。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人类史前历史上的第 1 次迁徙浪潮和第 2 次迁徙浪潮对于本地区的影响都是比较有限的,更没有深入到亚洲的腹地。“走出非洲”(单一地区人类起源)理论虽然有理有据,本地区显示出的文化证据则明显利于多地区人类起源理论^[33]。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位于东亚腹地华北的东方早期人类文化不仅自成体系,还更加深远地影响到了东北亚文化的发展,它与西来的文化在

西亚和中、北亚的某处交汇甚至在更北方的欧洲某结合部位发生过交相辉映、比翼双飞的迹象。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相当流行的因素在华北更早时期的文化里都能够找到踪迹,比如,最常见的锯齿刃器和凹缺器、端刮器等等,而那些常见的从小而狭窄的石核一端剥片的细石器工业的传统则可以远溯至华北泥河湾盆地的东谷坨遗址寻觅它们的母型“东谷坨石核”。北至波兰,西至西欧的小石器文化^[37],也未尝没有接受过来自东方的洗礼,东方文化的底蕴自人类发展的早期开始不能低估也可能并不像以往认为得那么平淡。2005 年夏天,南非古人类学家 Clarke 来华访问时与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对这一看法表示认同。他在对意大利罗马附近 Ceperano 发现的(距今 80 万年)直立人头骨化石重新复原所做的研究中明确指出该头骨具有明显的亚洲直立人特点的性质^[38],该研究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东亚古人类在那段久远历史当中可能产生过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 Wolpoff^[39]承认在非洲起源说盛行的同时,对于生活在欧亚大陆现代人起源的相关解释仍不免牵强,更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近年来已有人类学证据表示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时候确有外来人群融入欧洲的族

1)与吉笃学个人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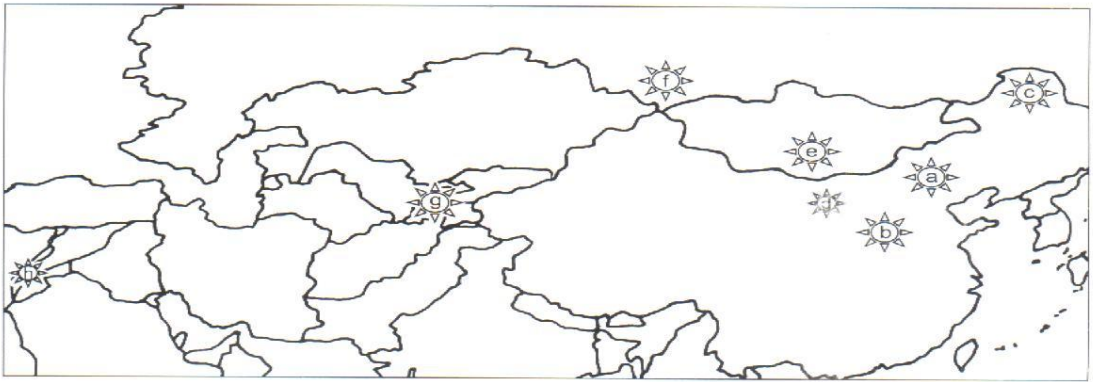


图6 旧石器时代东亚、北亚和西亚交流路线上的重要文化单元(a~h)示意图

④泥河湾盆地内外遗址群,如: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许家窑、虎头梁、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山西峙峪 ⑤中原地区遗址群,如:蓝田、丁村、下川、沙苑、灵井、小南海、后冈 ③海拉尔、扎赉诺尔、顾乡屯、十八站 ①水洞沟、萨拉乌苏 ② Flint Valley, Chikhen Agui, Tsagaan Agui, Tolbaga, Varvarina Gora, Makarovo IV, Aramovsky ⑥ Kara Bom, Denisova, Ust-Karakol, Kara-Tenesh ⑧ Obi-Rakhmat, Kulbulak, Shougnou, Kara-Kamar ⑦ Yfteh, Shanidar, Wawasi, Arjenah, Qafzeh, Hayonim, Kebara, Umm el Tlel

Fig.6 Several important cultural units in East Asia, North Asia and West Asia of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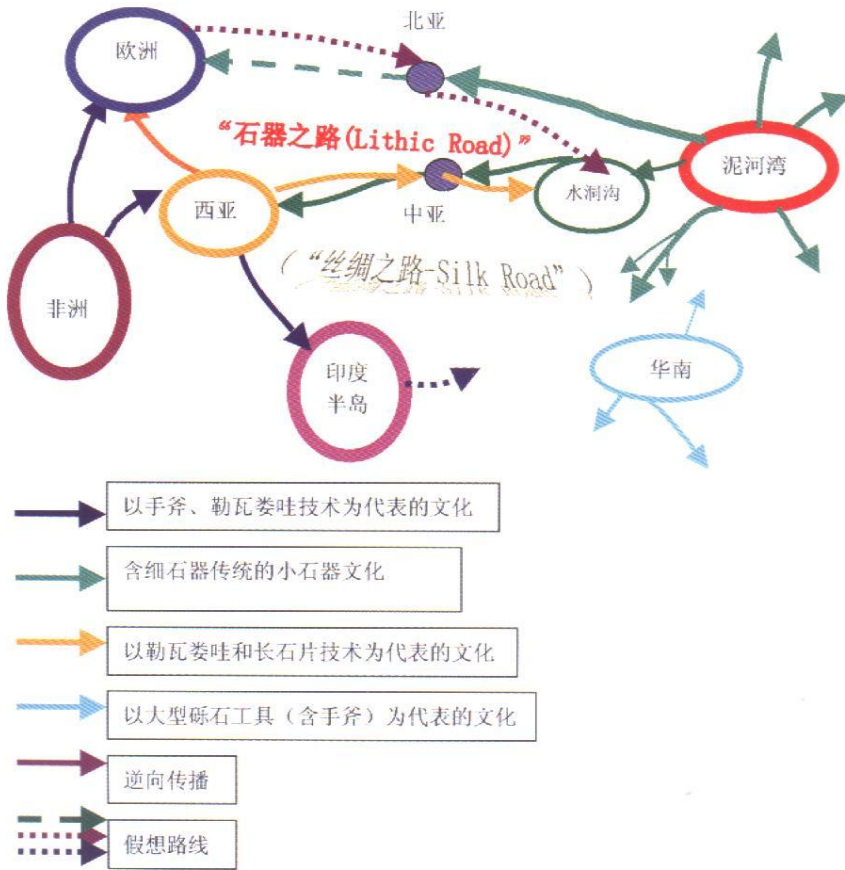


图7 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播路线示意图¹⁾

Fig.7 A Sketch map showing some active routes of cultural diffusion in Paleolithic time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发展和演化的以两面剥制技术制造出的标志性工具,通称阿舍利传统,存在于距今150~10万年;本图内含细石器传统的小石器文化主要指带有“DGT石核”文化因素的一类小石器文化传统;勒瓦娄哇和长石片技术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通过预制石核技术生产石片工具和勒瓦娄哇尖状器以及生产石叶工具的技术,以莫斯特和奥瑞纳时期为代表,存在于40~3万年间;大型砾石工具指以砾石为毛坯制作工具的技术传统,该技术类型以最早的奥杜威工业为典型在人类演化的各个阶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群的可能^[40,41]。Trinkaus的观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脱离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证据,现代人起源理论的非洲影响并没有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答案很可能会出乎我们的预料^[42]。

鉴于目前虽不完整却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业已确认的东西方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地位,本文认为,在历史文明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经过中期一直到晚期,在已知的“丝绸之路”的北部,在广大的中亚和东亚的北部地区东方与西方的人群之间的流动以及文化的交流一直存在,它实际上造就了一条史前文化的传播之路,在人类早期文化的发展融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将这条在史前时期曾经长长地将东西方连接到一起的路称为“石器之路(Lithic Road)”,这与刘东生提出“黄土石器工业”^[43]和“黄土之路”^[44]的说法似有同工异曲之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人地关系层面的思考和解释。如此,人、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承载着人与文化的环境背景成为密切相关的整体。水洞沟遗址的文化正是这条传播路线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伴随全球气候的变化,晚更新世后期我国北方处于亚间冰期向亚冰期的多次气候转型,大部地区出现了森林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转变,荒漠化日益严重^[45],人类的活动加重了环境的恶化,人类的活动中心不得不退后南移,一条历史长河中从未间断过的东西方文化传播路线也随之缓缓地向南移动,史前时期的“石器之路(Lithic Road)”¹⁾也许逐渐南移为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Silk Road)”,它见证了西亚和东亚北部环境渐趋恶化的历史,再现了岩石圈、生命圈、大气圈彼此相生相息的同一性。旧石器时代曾出现过多个文化中心和传播路线,这些文化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幅画卷(图6和图7)。

因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讨论和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待今后更多深入、系统的研究给予修正和完善以得出更加清晰的结论。

致谢 本文是为“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研讨会”准备的论文摘要和会议报告的大量修改后的成果。笔者特别感谢宁夏考古研究所促成这一题目以及最终成文;此外还要感谢法国巴黎第十大

学的Boëda教授与笔者合作研究了水洞沟80年代出土的石器材料;感谢宁夏考古研究所王惠民和钟侃为笔者从事水洞沟石器研究所给予的大力帮助;感谢李荣山为本文绘制插图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Boule M, Breuil H, Licent E et al.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1928. Mémoire 4: 1~138
-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水洞沟: 1980年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233
Ningxia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ed. Shuidonggou: Report on Excavation in 1980.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233
- 3 李炎贤.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 人类学学报, 1993, 12(3): 214~223
Li Yanxian. On the division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of Chin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93, 12(3): 214~223
- 4 黄慰文. 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 人类学学报, 2000, 19(4): 269~283
Huang Weiwén. Stratigraphical basic of the Paleolithic sequence of Chin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0, 19(4): 269~283
- 5 Lovlie R, Su Pu, Fan Xingzhao et al. Revised paleomagnetic age of the Nihewan group at Xujiayao Paleolithic site. In: Dong Wei ed. Proceedings of 1999 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leanthropology.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0, 19(Suppl): 270~278
- 6 裴文中, 吴汝康, 贾兰坡等.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1~111
Pei Wenzhong, Wu Rukang, Jia Lanpo et al.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Palaeolithic sites at Tingsun, Hsiangfensien, Shansi Province,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8. 1~111
- 7 李炎贤, 谢飞, 石金鸣. 河北原板井子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论文集.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74~95
Li Yanxian, Xie Fei, Shi Jim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ithic industry from Banjingzi Site at Yangyu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ed. Contributions to the XIII INQUA.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91. 74~95
- 8 贾兰坡, 卫奇. 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文化遗址. 考古学报, 1976, (2): 97~114
Jia Lanpo, Wei Qi. A Palaeolithic site at Hsu-chia-yao in Yangki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1976, (2): 97~114
- 9 曹泽田. 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8, 16(1): 68~72

1) 此前, 笔者曾使用“前丝绸之路 (Pre-Silk Road)”来表述这一概念

- Cao Zetian. Paleolithic site Xiaohuidong in Shuicheng Guizhou. *Vertebrata Palasiatica*. 1978, 16(1): 68~72
- 10 曹泽田·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2, 20(2): 155~164
- Cao Zetian. On the Palaeolithic artefacts from Mao'mao-dong (the rock shelter site), Guizhou Province. *Vertebrata Palasiatica*. 1982, 20(2): 155~164
- 11 李炎贤, 蔡回阳·贵州白岩脚洞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江汉考古, 1986, (2): 56~64
- Li Yanxian, Cai Huiyang. The secondary retouching work of stone tools from Baiyanjiao cave. *Puding Guizhou Jiangnan Archaeology*. 1986, (2): 56~64
- 12 李炎贤, 蔡回阳·白岩脚洞石器类型的研究·人类学学报, 1986, 5(4): 317~324
- Li Yanxian, Cai Huiyang. A study of the typology of stone tools from the cave of Baiyanjiao. *Puding Guizhou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86, 5(4): 317~324
- 13 李炎贤, 文本亨著·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5~181
- Li Yanxian, Wen Benheng. *Guanyindong: Th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al Site in the West of Guizhou Provinc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5~181
- 14 蔡回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石片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 1989, 8(4): 335~342
- Ca Huiy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lakes from the cave of Baiyanjiao. *Puding Guizhou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89, 8(4): 335~342
- 15 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 1985, 4(4): 289~300
- Wei Qi. Palaeoliths from the Lower Pleistocene of the Nihewan Beds in the Donggutuo site.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85, 4(4): 289~300
- 16 尤玉柱, 汤英俊, 李毅·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 1980, 5(1): 1~13
- You Yuzhu, Tang Yingjun, Li Yi. Discovery of the Palaeoliths from Nihewan Formation. *Quaternaria Sinica*. 1980, 5(1): 1~13
- 17 裴文中, 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古生物志, 1985, 12(新丁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277
- Pei Wenzhong, Zhang Senshui. A Study on the Lithic Artifacts of Sinanthropus. *Paleontologica Sinica*. 1985, 12 (New Series D). Beijing: Science Press. 1~277
- 18 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72, (1): 39~58
- Jia Lanpo, Gai Pei, You Yuzhu.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at Zhiyu Paleolithic site in Shanxi Province. *Kaoguxuebao*. 1972, (1): 39~58
- 19 张森水·马鞍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 1988, 7(1): 64~74
- Zhang Senshui. A brief report of the tentative excavation in Ma'anshan Paleolithic site.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88, 7(1): 64~74
- 20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 1965, (1): 1~27
- An Zhimin. A trial excavation of a cave deposit at Xiaonanhai Paleolithic site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Kaoguxuebao*. 1965, (1): 1~27
- 21 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 2003, 22(4): 279~292
- Hou Yamei. Naming and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ategory of the “Donggutuo Core”.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3, 22(4): 279~292
- 22 Eric Boëda著, 侯雪梅译·旧石器时代东亚、西亚之间的关系·第四纪研究, 2004, 24(3): 255~264
- Boëda E. Hou Xuemei (translator).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ia paleolithic age. *Quaternary Sciences*. 2004, 24(3): 255~264
- 23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 1990, 9(4): 322~333
- Zhang Senshui. Regional industrial gradual adva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90, 9(4): 322~333
- 24 Gai Pei.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 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论文集·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21~31
- Gai Pei.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ed. *Contributions to the XIII INQUA*,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91. 21~31
- 25 高星, 李进增, Madsen D B等·水洞沟的新年代测定及相关问题讨论·人类学学报, 2002, 21(3): 211~218
- Gao Xing, Li Jinzeng, Madsen D B et al. New ¹⁴C Dates for Shuidonggou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2, 21(3): 211~218
- 26 Wang Hongqiang, Deng Chenglong, Zhu Rixiang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 the Donggutuo and Malianjiao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Quaternary Research*. 2005, 64(1): 1~11
- 27 Zhu R X, Hoffman K A, Potts R et al. 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2001, 413: 413~417
- 28 Zhu R X, Potts R, Xie F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2004, 431: 559~562
- 29 卫奇·泥河湾盆地考古地质学框架·见: 童永生, 张银运, 吴文裕等编·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7. 193~208
- Wei Qi. The framework of archaeological geology of the Nihewan Basin. In: Tong Yongsheng, Zhang Yinyun, Wu Wenyu et al eds. *Evidence for Evolution Essays in Honor of Prof. Chungchien Young on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1997. 193~208
- 30 李超荣·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见: 松藤和人.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e in the Japanese

- Archipelago 京都: 协和株式印刷会社, 2004. 37~62
- Li Chaoro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cultures in North China. In: Matsufuji K ed.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e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Kyoto: Kyowa Insatsu Association. 2004. 37~62
- 31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 1978, (3): 289~316
- An Zhimin Remains of Microliths in Hailaer: A discussion about origin and tradition of Microlithic Kaoguxuebao. 1978, (3): 289~316
- 32 Otto M, Kozłowski JK. The issue of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1, 3(7): 51~62
- 33 Derevianko A P. The Middle to Upper Palaeolithic transition in the Altai (Mongolia and Siber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1, 3(7): 70~103
- 34 Teilhard de Chardin P, Pei W C.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 in Choukouti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2, XI (4): 339, 354
- 35 Pei W C.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 new palaeolithic station known as Locality 15 within the Choukoutien regio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9, 19: 147~187
- 36 Wu Xinzhi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4, 117(1): 131~140
- 37 Burdukiewicz JM, Avraham R.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Lower and Middle Palaeolithic small tool assemblages. In: Burdukiewicz JM, Avraham R eds. Lower Palaeolithic Small Tools in Europe and the Levant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15). Oxford: The Basingstoke Press. 2003. 235~239
- 38 Clarke R J. A corrected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mo erectus calvaria from Ceprano Italy.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0, 39(4): 433~442
- 39 Wolpoff M H. The Middle to Upper Palaeolithic transition in the Altai (Mongolia and Siber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1, 3(7): 63~67
- 40 Churchill S E, Smith F H. Makers of the early Aurignacian of Europe.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00, 100(4): 61~115
- 41 Holliday T W. Body proportions in Late Pleistocene Europe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97, 32(5): 423~447
- 42 Trinkaus E. Neandertal posterania and the adaptive shift to modern humans. In: Trinkaus E ed. The Mousterian Legacy: Human Biocultural Change in the Upper Pleistocene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64). Oxford: The Basingstoke Press. 1983. 165~200
- 43 刘东生·黄土旧石器工业. 见: 徐钦琦, 谢飞, 王建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52~62
- Liu Tungsheng The lithic industry in loess. In: Xu Qinqi, Xie Fei, Wang Jian eds. New Advance of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ian Jia Lanpo's 90th Birthday.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9. 52~62
- 44 刘东生·李希霍芬和“中亚人与环境”. 第四纪研究, 2005, 25(4): 405~408
- Liu Tungsheng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and “Man and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 Quaternary Sciences. 2005, 25(4): 405~408
- 45 董光荣·中国沙漠形成演化气候变化与沙漠化研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2. 1~734
- Dong Guangrong Chinese Desert Formation, Climatic Change and Desertification.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2002. 1~734

SHU DONGGOU: A VANE OF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DISCUSSION ABOUT SMALL TOOL CULTURE IN NORTH CHINA
AND A HYPOTHESIS OF THE “LITHIC ROAD”

Hou Yame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Shuidonggou (SDG) culture, its western characters of Middle Paleolithic and Upper Paleolithic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adduced as favorable eviden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owever, it is still vague about how the communication occurred in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or it is just telling one story of “complete influence from the West”. By recognizing the existence of Levallois technique in SDG culture, this opinion can only be reinforced. Whereas, new evidence make it possible to be doubted and survey anew th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e.

Based on many fine researching work made by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a pertinent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many common phenomena of typical Paleolithic sites in North China and circumjacent region have been revealed. Among them, the “Donggutuo (DGT) core” identified by the present author from SDG and some other sites is taken as a key clue and full characteristic of Eastern cultural style rooted in the East far time ago. Corresponding to Levallois core in the West, the DGT core is an Eastern example as a cultural mark in prehistoric time. Nay, it had been exported and transported into a big surrounding area in North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The “DGT core” and relevant cultural assemblages provide a lineal development of Paleolithic culture in North China. It represents the most primitive shape of narrow-shaped core which has been researched as a rooted type of microlithic wedge-shaped core in the vast territory of Northeast Asia, especially in East Asia. The “DGT core” can be taken as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upports the Northern China Origin of microblade tradition. This issue not only concerns the problem of origin of early human but also modern human. The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Continuity and Hybridiz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brings forward a new perspective on situation of SDG culture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rough the reappearance of “DGT core”, and discusses the dominant and diffusive role played by the small tool industry of North China. Further,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concepts of “North China center” and “local-originated dominance and diffusion of small tool culture in North China”. A hypothesis of “Pre-Silk Road” namely “Lithic Road” is also proposed by the author in the article.

Like many Middle and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in Middle and North Asia, SDG culture is supposed as one example of a vane of indicating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intercommunication and diffusion along the road during that time. Meanwhile, some relevant evidence of anthropology has also been well discussed. Finally, the driving for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ty compell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very much emphasized in the article as well as evidence presented from both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are putting in good prospect.

Key words Shuidonggou cul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onggutuo core”, local-originated dominance and diffusion of small tool culture in North China, “Lithic Road”

《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1期主要研究论文预告

青藏高原东北缘晚新生代的扩展与隆升	张培震 袁道阳 郑德文 尹功名 张广良
祁连山北部现代侵蚀速率及其与构造和气候的关系	潘宝田
祁连山北缘玉门砾岩的褶皱过程及年代	陈杰 卢演涛
天山北麓晚新生代沉积以及构造意义	孙继敏 朱日祥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晚新生代走滑—逆冲作用的地貌标志	李勇 周荣军 A. L. Densmore M. A. Ellis
青藏高原北部第四纪早期断裂活动的新生性变化初步研究	田勤俭 丁国瑜
构造、气候与砾岩——以积石山和临夏盆地为例	
.....郑德文 张培震 万景林 袁道阳 李大明 王建平 尹京武 李传友 王志才	
南海北缘早—中更新世之交新构造活动及其区域对比	
.....朱照宇 谢久兵 郑王琼 莫生 杨超 饶志国 周厚云 王俊达	
南海西北部珊瑚礁记录所反映的新构造运动	詹文欢 朱照宇 孙宗勋 孙龙涛 姚衍桃
黄河源区冰楔假型群的发育及其古气候意义	程捷 张绪教 田明中 于文洋 唐德翔 岳建伟
内蒙古狼山—色尔腾山的剥蚀面序列和景观发育的控制因素	程绍平 李传友 杨桂枝 任德风
西藏东南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第四纪多次冰川阻江事件	
.....刘宇平 D. R. Montgomery B. Hallet 唐文清 张建龙 张选阳	
锅穴一定是第四纪冰川的标志吗?	周尚哲